



红色 密档

李庆山 编著

中共之初

★ 解读秘密档案 扫描历史细节 还原历史真相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共之初

李庆山 编著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之初 / 李庆山编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红色密档 ; 1)

ISBN 978-7-5438-8944-6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1921～1927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3056号

出 版：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230000

印 张：19

出版时间：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谢清风

责任编辑：曾赛丰

特约编辑：刘丹 叶 颔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美术编辑：靳 莹

ISBN 978-7-5438-8944-6

定 价：38.00元

发 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010-64426679

邮购热线：010-64421810

传 真：010-64427328

公司网址：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pd@yongsibook.net

第一章 春雷 / 1

- 五四导火索 / 2
- 许德珩起草“救国”宣言 / 8
- 北京数千名高校学生齐聚华表下 / 13
- 毛泽东的伯乐善意纵火 / 17
- 五四运动中的工人和农民 / 23

第二章 “老祖宗”最初在中国 / 33

- 1899：“老祖宗”在中国出现 / 34
- 《共产党宣言》最初在中国的流传和中文全译本的问世 / 39
- 李大钊在中国首传马列 / 46
- 孙中山与列宁 / 53

第三章 开天辟地 / 61

-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 / 62
- 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 / 64
- 神秘来客 / 69
- 列宁派马林来华 / 75
- “一大”代表赴会记 / 83
- 划时代一幕 / 89
- “党必须非法地工作” / 91



险遭大劫 / 92

小船上完成划时代使命 / 95

第四章 第一次握手 / 103

马林往返于国共俄之间 / 104

达林表示对国共合作的关心 / 114

西湖会议 / 117

孙中山、李大钊握手黄浦江畔 / 120

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 / 122

23位共产党人亲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 128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真实态度 / 133

第五章 是兄弟还是父子? / 145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 146

他有力地促使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 151

远东局在华始末 / 155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军事指导 / 165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 173

中共支持中苏建交真相 / 175

第六章 锤子、镰刀 / 183

- 刘少奇领导安源大罢工 / 184
- 罗章龙诉述“二七”惨案 / 189
- 五卅运动始末 / 191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农民运动 / 197
- 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洗会”运动 / 200
-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及其前后 / 204

第七章 初试刀枪 / 209

- 中共早期的军事活动 / 210
- 中共在创建黄埔军校中 / 216
-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红色武装 / 221
- 叶挺独立团的创建 / 223
-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的先声——顺泸起义 / 227
- 中共中央领导发动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 / 238
- 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北伐 / 247
- 北伐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和实施的 / 253
- 共产党人在北伐战争中 / 256



第八章 危机 / 265

- 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 266
- 中共对整理党务案作出让步的主要原因是联共（布） / 276
- 为什么会有《汪陈联合宣言》的抛出 / 280
-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 283
- “四一二”政变内幕 / 287
- 大革命失败的实况剪辑 / 294



第一章 春 雷

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中国派出代表多达52人，提出七条“希望”，一条也没被列强采纳，同时山东主权又从德国手中转给日本，这使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京高校学生们通宵达旦地忙碌着，许德珩奉命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5月4日下午，数千北京高校学生集会天安门。匡互生在众口一词的鼓舞下，点火焚烧赵家楼。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农民也参加了五四运动。

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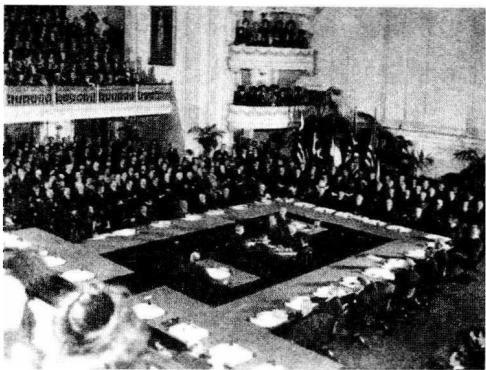
年的春天，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风云激荡、山雨欲来，代表中国新生力量的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下，以冲天的胆识、热情、鲜血、知识和理性，引导着“东亚病夫”开始迈出“青春中国”的第一步——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犹如响彻云霄的一声春雷，打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沉闷局面，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出现了高潮。与此同时，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进入更快的孕育之中。

■ 五四导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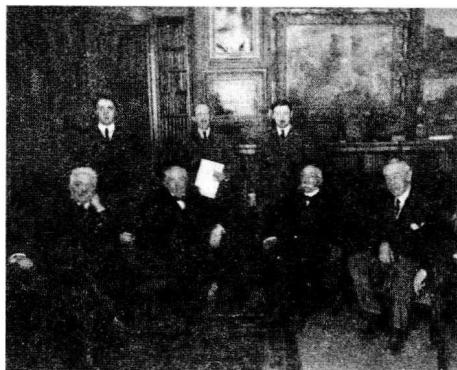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界标，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即将走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将要横空出世的前夜。那么，是什么引发了五四运动？让我们打开 90 多年前早已尘封的历史档案，一看究竟。

19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正式开幕。应邀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到达的有 20 余国，派出的与会人员共达 1000 多人。会议开幕后，推举了东道国总理——法国总理克雷孟梭为和会主席，意大利总理奥兰多任副主席。会议的决策机构，依然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所组成的最高“四人会议”。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包括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 5 位全权委员——亦即专使在内，共计 52 人，其中有专家 17 人、美籍顾问 5 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遵循总统府外交委员会拟订的向和会提案大纲的原则，向和会提出“七条希望条件”，即：（1）列强放弃在华势力范围；（2）撤退在华外国军队、巡警；（3）裁撤在华外国邮政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4）撤销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借地；（6）归还租界；



1919年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上的“四巨头”（第一排）

(7) 保持关税自主权。

在“七条希望条件”候批之时，密切注意巴黎和会的中国留欧学生结成团体，派出代表，明确要求中国代表团利用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条款十四条》主张，向和会提出废除日本强加中国的“二十一条”。于是，代表团在爱国力量的压力下又另行拟订了一份取消1915年5月25日中日协约及换文《中日民国四年条约》的《陈情书》。

随后，中国代表团将上述两个文件，同时提交了巴黎和会最高“四人会议”审议。但为了达到主要目的，中国代表又以直接归还山东和取消“二十一条”作为“迫切要求”，其余各款议题仅作为“希望条件”提出，提请和会加以考虑。如此用心，可谓委曲求全！

但是，中国的上列两项提案均被最高会议拒绝。

1月27日午后1时许，顾维钧忽然接到他的友人、美国远东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的私下告知：“十人会议上午讨论德属殖民地归属问题，日本代表在会上要求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由此才临时决定本日下午3时讨论山东问题，因而中国代表将应邀到会，对山东问题表明立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立即引起了代表团的高度重视，他们马上商议对策。可是，大家发现：陆征祥今日没来参加午餐会。原来，作为首席代表的陆征祥已知这一消息。陆征祥既在袁世凯手下接替孙宝琦出任过外交总长，并与外交次长曹汝霖、司法总长章宗祥一道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谈判过“二十一条”条约问题，又是这次代表团中唯一知道中日关于山东问题密约

详情的人员。可是，直到 26 日他才将山东换文之事透露给其他各位代表。此时，他正称病独卧在他的房间里养息，借以回避出席会议。

顾维钧知道十人会议的成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相贝尔福，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外长毕盛，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外长松尼诺以及日本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 10 人。于是，略作思考后，顾维钧迅即前往蓝辛处拜会，请其支持中国。对此，蓝辛表示：“敝国一向奉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一定与贵全权代表密切合作。”这加强了顾维钧抗衡日本的信心。

鉴于时间紧促，顾维钧随即告辞，赶回代表住地吕特蒂旅馆会合王正廷，匆匆地一同前往最高会议会场——法国外交部大楼。此时，五强代表已经就座。

此刻，牧野见中国代表王、顾两人匆匆地赶来，估计中国代表无所准备，遂在会议伊始即行先发制人。他有恃无恐地抢先发言说：“山东地区是日本参战后，付出惨重牺牲的代价才从德国手中夺取的领土。我们不能应允德国在战后再据有这些地区。因此，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无条件地让与日本国，才是公平的。”



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

鉴于日本只字不提山东的主权归属，顾维钧接着发言说：“席间，日本首席代表牧野先生代表日本政府提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地让与日本。对此，本全权受权表示：日本为中国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且牺牲不少，此为敝国所当竭诚申谢的。然而，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播将来纷争之种子，则为本全权代表所不得不力争的啊！”

继而，牧野又从席间立身反驳说：“日本占据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我国属领之区，而且，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之约，并且，对于铁路方面，

亦有成约为凭。”——牧野这番补充，倒还事出有因：1918年9月24日，日本外相后藤新平曾经致电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再次提出山东问题，强索在济南等地的驻军权，要求合办胶济铁路，并参与该路沿线的警务权；但对于其非法设置的民政机构的撤废，却不曾定出具体的期限。面对如此横蛮的侵权要求，章宗祥居然以“欣然同意”四字作复。这就给了日本此时拒还山东以重要口实与强词夺理的把柄。

牧野的补充使中国代表大感意外。顾维钧接着发言说：“山东问题与我国关系至大，请会议给予中国一定时间，俟中国代表团提出正式意见后，再行讨论。”十人会议同意翌日听取中国代表团意见。

会后，中国代表团集中精力以研究山东问题的历史渊源。1898年，德国迫使清朝政府与之签订了租借山东的《胶澳租界条约》，强行租借胶州湾99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进犯中国山东水域，11月7日，日军攻陷青岛，驻山东的德军投降。至此，中国的山东竟然在德、日之间易手！

为了长期霸占山东，1915年1月18日夜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按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训令，在绘印有无畏舰与机关炮图案的日本陆军省用笺上，写就灭亡中国的要求条件“二十一条”，并直呈中国总统袁世凯，用此作为日本赞同他称帝复辟的前提条件，要求袁世凯认可。这“二十一条”共分五项，首项即为山东问题，要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加以充分扩大。日本的目的是企图将其对山东权益的侵略，用条约固定下来。5月9日在袁世凯指令下，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外，中国代表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1919年4月22日，和会召开大会，中、日代表应邀出席。日本代表牧野在陈述意见后，更声称：“已接到本国训令，非俟山东问题解决后，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同时，又



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签署了《中日民国四年条约》，即“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

分发提议草案，还公布了1917年二三月所定日英、日法、日意秘密协定。唯有日俄协定，因为俄罗斯已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成立了苏俄新政权，此次将俄国新政府拒之巴黎和会之外，遂未公布。继后，日本代表据之要求英、法、意三国代表表态践约。

于是和会会场形成沉默之局。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提议：既已听取了日本政府代表的陈述，而此事涉及中国，当许中国政府代表到会发表意见。各国代表均无异议。和会秘书处旋于下午3时许，才临时通知中国政府代表团于4时莅会陈述。其时，照例当由顾维钧、王正廷两位全权代表赴会。但因王正廷已经赴世界交通委员会无法分身，遂由陆征祥与顾维钧两人前往与会。陆征祥在会议期间，素不多言，此次抗辩，更指囑顾维钧相机行事。

对此棘手的托嘱，顾维钧也不作谦让。当他们接通知到达威尔逊的寓所后，才发现只有五人在场，即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英文翻译汉基、法文翻译某法国海军上校。入得会议厅不久，顾维钧即被邀代表陆征祥发言，继续申述了中国政府对山东拥有的无可置疑的主权事实。

但英国代表劳合·乔治首相却向中国代表提议说：“山东问题，现有两种解决办法：其一是由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其二则由中日两国相互履行自订契约以为凭证。不知贵代表的意见，认为何种可行？”这明确地表露了对日本的袒护态度。

顾维钧一听，这种关于将中国山东权益或直接交由日本，或由中日通过订约交出的提议，其方式表面为二，但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顾维钧便婉谢说：“此两种办法，皆非我国所愿接受或选择的。因为德人在山东的权利，由于我国对德宣战和条约失效的结果，其在我山东省窃夺之权益已根本被取消，故不再有何继承的余地可言。至于两国自订契约之事，则因为日本关于山东之内容，都是基于不正当手段所窃获，完全未曾得到过中国民意的承认。此次敝国应邀出席参加巴黎和会，其目的本望这不公平的山东问题，当能依正义与公道之裁判而加以撤销之。哪还有再次履行自订契约之必要呢！希望与会各强国能伸张正义而维护公理。”

言毕，顾维钧注视美国总统，意图能引起对方的关注而作出支持表示。可是威尔逊不但表示了无能为力的推托态度，并且还当面质问中国代表说：“1918年9月，当时协约国军其势甚大，胜利在望，停战在即，故日本绝不

能再敢强迫中国，为何贵国全权公使竟然又以‘欣然同意’之无保留态度，对于与其订立的有关山东问题的新约，作出了换文承诺？”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则发言支持劳合·乔治说：“英首相所言，亦即完全为我法国之意，请贵代表予以考虑。”至此，列强的倾向完全转归了日本！

4月30日，由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雷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组成的三人最高会议最后决定，将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日本，并写入对德和约的第156、第157、第158条。这样，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完全失败了，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竟和战败国一样受到惨痛的宰割！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广大知识分子已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大敌，但对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大肆宣扬大战的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尤其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条款十四条》，高唱反对秘密外交，主张民族自决等，迷惑了很多人。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称颂威尔逊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人们以为可以从巴黎和会上争得中国在国际上的独立平等地位了。

但是，巴黎和会的严酷事实，无情地粉碎了这种幻想。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决定国家的命运。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0号上发表的《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时评文章，反映了人们这种新的觉醒。他说：“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巴黎会议“与世界永久平和，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上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对帝国主义本质作了更深刻的分析，认为不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帝国主义都一样是不讲公理的强盗。现在的世界，是“强盗的世界”，“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总之，严酷的现实惊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明白了帝国主义都所谓的“公道”、“和平”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国家的命运非由自己“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于是，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为导火线，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 许德珩起草“救国”宣言

1919年，北京的春天，风沙扑面，让人的心情不好受；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新闻传来时，使人更加烦躁不安。

噩耗终于传来，并且得到了证实。5月1日，上海《大陆报》之北京通讯说：“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5月2日，身为徐世昌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也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证实了这一噩耗。

在此以前，当4月下旬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到中国的时候，各地各界人民均已愤慨万分。4月20日，山东人民10万余人已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当时，山东的爱国人士纷纷到北京来活动，北京的爱国人士也纷纷到山东、上海等地去活动。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听到外交失败和政府准备签约的消息后，他赶忙去了沙滩北京大学校本部。他以校长身份，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

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参加会议的学生听了讲话后，心情非常激动。

5月1日下午，《国民》杂志社开会。许德珩、张国焘、黄日葵、孟寿椿、廖书仓、夏秀峰、谢绍敏、段锡朋、邓中夏等，在会上讨论了巴黎和会。到会的10多个社员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中国外交在和会上受辱遭挫的情形，以及曹、章等人媚颜日与山东及其他各处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



蔡元培

后来，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社员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了！最终，大家以救国责无旁贷的精神作出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大示威，并且还草拟了宣言，于会后送往全国各报；同时，他们又决定：由《国民》杂志社

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 7 时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和法专等学校派代表参加，讨论应对办法。

高师的国民社成员熊梦飞在会后回到学校，便告诉了同言社的匡互生：“北大国民社决定在 5 月 7 日发动大示威。”

同言社是由高师学生匡互生、周予同、张石桥和陈宏勋等在 1918 年 5 月的请愿失败后成立的。当时那些热烈的学生觉悟到，“做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

取名“同言社”，以练习讲演为名，是为了避开学校的干涉、秘密准备再一次的请愿活动。同言社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成立的，就其爱国热情而言，同言社并不逊于国民社。只不过它长时期内的活动都限于高师本校范围内，而以组织名义在校外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活动与联系，因此，北京学界知道同言社的人不多。此时有成员 30 余人。

不过，随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日渐受挫的消息传回国后，北京高师的同言社负责人匡互生等，也开始同国民社的易克嶷、夏秀峰、熊梦飞以及北大的罗章龙、罗汉等爱国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有所联络。他们二三十人常常聚在一起议论时局和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特别地关注巴黎和会的进展。后来这个组织中的不少成员逐步地接受了工学主义思想，即认为：“做工与求学是人生两件大事，除此以外别无其他要求。”

当匡互生在熊梦飞处得知了国民社的打算后，就决心要响应 5 月 7 日大示威的号召，并拟于次日晚上召开同言社全体会议，具体研究办法。

5 月 3 日，北京市民的各个阶层，包括学界、商界、政界以及少数的军人，都得知了青岛交涉失败的噩耗；所以，尽管林长民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外交警报敬告国人》的文章只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而未细及噩耗的具体内容，可是对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定局，人们已经不存幻想了：“国亡无日，愿集合四万万众而誓死图之！”于是，大都举行了各式各样的会议，商讨怎样抗议对山东问题的无理处置，并决心速起图之。

北京商会通电各地商会，相约共同行动一起争还山东问题，而上海商会立即回答说：“已商定将于 6 日召开大会，筹议对付办法。”

在此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陈独秀又特别为《每周评论》即将出刊的

第 20 期撰写了重要的时论文章——《两个和会都无用》。这篇时论集中地表达了民众的思想和内心呼声，发出了具有力度的呼吁与号召。他在文章中说：“上海（南北政府代表）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 14 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

“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陈独秀在文中所作“非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的断言和号召，及时地表达了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各界、各阶层爱国民众的主张和感受！

5 月 3 日是星期六，这本该是休息的周末，北京大学却沸腾起来了。学生们怀着满腔怒火与赤子之心拥向北河沿法科礼堂，他们边走边议，慷慨激昂：既痛骂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也憎恨英、法、意与日本一鼻孔出气，还后悔上了美国总统 14 条宣言的当。有的很幽默地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14 等于零。”

这天晚上 7 点不到，法科礼堂已经拥进了 1000 多人。这里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多数学生之外，还有下午曾在法政专科学校集会商议拟于 5 月 7 日在天安门开北京全体学生游行大会的代表们。他们来自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专、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大学、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

大会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因为，5 月 2 日《国民》杂志社会议推定的易克嶷此时不在场；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两人担任记录；并且，推举文科学生许德珩起草《宣言》。

大会开始后，先由《京报》主笔、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报告山东问题以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与目前形势。他在介绍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活动失利情况后，说：“失败的原因，完全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秘密订立的高（密）徐（州）、济（南）顺（德）两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写着有‘欣然同意’四个大字，成为日本人的把柄……”